



## 中国奥数选手第一号

### ——中国首次参加国际奥数比赛的个人经历

王 锋

转眼之间，距离当年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已经过去三十五年<sup>1</sup>了。作为代表中国首次参加国际奥赛的选手，我算是所有历届中国奥赛国家队队员的老大哥了。和三十多年后“全民奥数”的环境相比，我们当年参加数学竞赛的经历非常不同。第一次参加竞赛是小学五年级，那是1978年，是学区范围的竞赛，题目并不超出平时数学课的内容，所有同学都参加了。那次是全学区只有我拿了满分，是第一名，获得了奖状和奖品，第一次在一个大礼堂给好多家长和学生分享自己学数学的心得，还觉得很新奇。初中考进了北大附中，学校的老师们在课后开办数学兴趣小组，参加的同学不少，每周一次，讲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专题。海淀区少年宫也有一些老师组织的课外班，还有在北京市范围的数学讲座，都是学校老师推荐的，由学有余力的同学参加。竞赛每年都有，竞赛优胜者（包括我在内）保送本校高中，不过其实这些同学即使参加中考也一样可以轻松考上，所以参加竞赛是没有什么功利性的。

高中的竞赛就有一定深度了，而且数学、物理、化学和计算机编程竞赛全面开花。我在高中物理、化学和计算机竞赛中的成绩都不错，当然最看重的还是数学竞赛。一天，数学小组的老师说，下周咱们去参加“中美数学对抗赛”！我觉得很奇怪，美国学生会来北京吗？那时候我们出一趟北京都是不得了的大事，为了参加数学竞赛而出国更是天方夜谭，所以第一反应就是美国学生来北京比赛。三十多年之后的今天，中国学生到美国参赛一点都不稀奇，然而美国学生（尤其是非华裔）到中国参赛才真是匪夷所思；前几年我曾亲自从美国带了二十名学生去中国参赛，其中有好几位是白人孩子，这是相当难得了。三十多年前的“中美数学对抗赛”，其实就是美国高中数学竞赛AHSME，是现在AMC10、12的前身，当时北京、上海各有一处考点，赛后答题纸会寄往美国。通过了AHSME，就可以参加下一轮，叫做美国数学邀请赛AIME。高二那年我第一次参加，虽然也进入了AIME，成绩不算突出，也没太往心里去。一年



<sup>1</sup> 本文写于2020年。



吴思皓（左）和王锋在参赛期间合影

一度的高中联赛才是重中之重；本校老师在赛前专门召集同学们开会进行准备，让大家调整好自己的状态，发挥正常的实力。和现在“备赛集训”不同的是，当时除了在数学小组活动时间多做几道练习题以外，没有什么过多的训练，竞赛中全凭各人平时的水平。



回想起来，虽然那时候没有奥数冬令营和各种培训班，但是有很多积极推动竞赛活动的老师，包括中科院的裘宗沪老师、北京师范大学的周春荔老师，还有胡大同、梅向明、张君达老师等等（很多老师的名字我都不记得了），再有就是我在北大附中高中的班主任周沛耕老师。很显然，数学比较突出的学生在这些老师那里都“挂了号”的，虽然本人并不知情，但是我们的任何成绩都在老师们的关注之下。记得高三那年的一天晚上自习课的时候，周沛耕老师把我叫出来，郑重其事地讲，有一个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，是世界上水平最高的中学生数学竞赛，中国有可能派队参加，而我则是可能的人选。前面提到，那时候对出国参加竞赛这种事，连想都没想过，当它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可能性的时候，心中是有一些震撼的。

我对自己的数学竞赛实力还是有比较清楚的认识的，从高中联赛等几次大大小小的数学竞赛，再包括高三（1985年）再次参加美国的 AHSME 和 AIME 获得的成绩来讲，当时在北京的同龄人中已经没有对手了。不过，国家代表队到底会如何选拔，以及那一年是否真能成行，还是个未知数，而且国际竞赛的题目到底是什么内容也不了解，因此这件事也就是心里有个数，平时该干啥还干啥。后来才知道，因为种种原因，到3月份才确定要去参赛（比赛是7月初在芬兰举行），而我得到确定被选中的消息则已经是最后关头，一个月内就要出发。

那几个星期感觉过得非常快，先是和带队的裘宗沪和王寿仁两位老师见面，



芬兰首都赫尔辛基（图片取自网络）

然后见到了从上海坐火车来北京的选手吴思皓，每天到中关村由单增老师给我们做突击辅导。前面说过，我们当时的数学水平，靠的是平时课内和课外的积累，没有经过系统性的训练。我对代数、几何还算是比较熟的，组合也有一定基础，而数论就基本上没有学过了。好在我平时还自学了一些抽象代数，其中的基础知识涉及到有相当深度的数论知识和方法。单增老师给我们辅导的地方是中科院的一间锅炉房，在机器的轰鸣声中，我们经历了不到10天的培训。在此期间，护照、签证等等手续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，终于在6月25日临行前一切就绪。

我们这次能够成行，实属不易。早在此前两年，裘老师就计划参赛，然而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被批准。这一次，裘老师再次向国家教委提出参赛，用的理由是：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中，只有中国没有参加这项竞赛了！终于得到了批准。这是中国第一次派队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，虽然因为时间仓促，只选了我与吴思皓两名队员参加，但是其意义非同小可。去芬兰的经过也很曲折：因为批准得晚，等中国向芬兰的竞赛组委会提出要报名参赛的时候，组委会的回复是“报名截止日期已过，今年不再接受报名了”。据当时的组委会主席莱赫丁恁老先生多年后向中国队领队透露，在那一届开赛前几天，组委会接到中国驻芬兰大使馆的电话，说是中国队到了！组委会别无他法，只好给我们安排住宿和参赛。这些幕后的故事，我和吴思皓当时完全不知道，其实我们能够参赛，是非常幸运的。

第一次走出国门，拿到自己的第一本护照，人生第一次坐飞机，在多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，都像做梦一样。那时候中国和芬兰之间没有直飞航班，机票又买得晚，所以实际的行程是绕了一大圈，换了好几次飞机：从北京出发，到中东地区的沙迦城，再到法国巴黎，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停留，然后到达目的地——芬兰的赫尔辛基。回程就简单多了，从赫尔辛基飞往莫斯科（当时是苏联），停留四天后飞回北京。全程经过了除中国外的五个国家和地区。这也是第一次发现我晕飞机！一开始是中国民航的波音747还比较平稳，机组人员给找来治晕机的药，问题不算大，后来是法航的飞机，飞行员开得比较野，尤其是起飞降落，难受无比，飞机上提供的晚餐也根本吃不下，还要停那么多站，

